

國際戰略研究 簡報

2023 年 12 月 22 日

第 152 期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第九届“北阁对话”嘉宾观点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陈丹梅、马丽澳、王润泽

北京大学第九届“北阁对话”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在北京大学北阁举行。本届对话以“全球安全治理：现状与前景”为主题，邀请二十余位中外前政要和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线下讨论，取得良好效果。现将与会者观点总结如下。

一、中美战略竞争与避免致命对抗的途径

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中美关系依旧紧张，但近期出现了渐趋稳定的积极迹象。中美应当保持两国之间的官方沟通，并增进民间交流。同时，两国不应使国内政治因素过多地影响双边关系。

有外方与会者指出，中美之间致命对抗的潜在爆发点主要在于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些政治势力试图改变美国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的立场，包括鼓吹给予台湾“外交承认”。他相信这种企图不会成功。在南海问题上，他认为“南海仲裁案”的裁决难以改变，而该裁决将持续影响国际社会，特别是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另有外方与会者认为，中美关系最终取决于两国自身，而两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因此中美关系可以实现长期稳定。他不认为台湾问题或南海问题是双方之间潜在的冲突爆发点。在台湾问题上，台湾无法利用

美国达到自身目的；台湾与大陆还有谈判的空间。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主张并非缺乏根据，但中国拒绝参与仲裁庭的任何程序，这使中国陷入被动，并非明智之举。他希望未来南海周边国家能够谈判并达成妥协，使南海成为联通本地区的“地中海”。他还提到，东盟也不希望中美发生冲突，东盟与中国的经济融合将会继续加深。

中方与会者指出，只要美国还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就很难得到大幅改善。许多美国人都在谈论中美之间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可见美方对双边关系的期待非常有限。中方拒绝接受美方将双边关系定义为“竞争”，原因在于中国认为“竞争”是争夺霸权的代名词，而中国无意争夺霸权。

在讨论环节，有外方与会者表示，“新冷战”和“脱钩”的说法具有误导性，中美之间无法“脱钩”。对于存在安全风险的领域，美国可以通过“小院高墙”政策进行“去风险”，但当前“小院”存在扩大的趋势。美国不寻求像冷战期间遏制苏联一样遏制中国，只是在寻求一种均势；中美并非“注定一战”，中美互不构成关乎对方生存的威胁。他认同以“竞争性共存”的说法来描述当前的中美关系。

有中方与会者提出，当前中美似乎都受限于对对方国家未来走向的判断。如果中美都坚信对方国家正在衰落或即将衰落，那么双方行事都会更加强硬、缺少灵活性。

另有中方与会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美国争夺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因为美国主观上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会改变既定的国际秩序，但这种关于国际秩序的竞争本身不会导致两国发生战争。

还有中方与会者批评美国政客利用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来为其对华强硬态度背书，而正是美国精英的叙事使公众对中国的观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迅速恶化。他进一步指出，2016年至2019年，中美力量对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中美关系却已开始恶化，这是结构性因素不能解释的，需要考虑能动性因素，即双方对对方的认知。

中方学者提醒，过度强调台海将会发生战争的预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会给中方决策以及中美关系平添困难。

外方与会者建议，疫情后的中国应当重新向世界开放，特别是要让更多外国的年轻人来中国看一看。

二、欧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与会者重点探讨了俄乌冲突相关问题，也谈及了欧亚地区的特征与“一带一路”倡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俄乌冲突将会持续。俄罗斯难以取得新的进展，美国和北约不会直接参战，在此条件下乌克兰难以收复失地，战场将形成长期相持局面。同时，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俄乌冲突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欧亚地区甚至全球的安全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

一位外方与会者分析指出，冲突影响到了俄罗斯与西方在核军控方面的合作。美俄双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陷入停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国际多边军控的支柱也正在崩塌，这使一些存在核扩散可能的国家有了可乘之机。

俄乌冲突的影响外溢到了欧洲之外。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及近期世界各地出现的武器扩散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俄乌冲突影响。在一些重大地区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几乎陷入瘫痪，其韧性似乎正在临近极限，这十分危险。对此，这位与会者建议：第一，应当先实现停火，随后展开谈判。第二，更多依靠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制，争取在核问题上实现战略稳定。第三，地区冲突的解决将取决于多边机制能否鼓励俄罗斯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利益相关者”。

关于停火，另有外方与会者建议，停火协议必须考虑两个民族的历史才能使局势稳定下来，即在两国各自控制的区域，保留对方民族的语言文化，确保人员能够流动。

与会者重点探讨了俄乌冲突的发展前景。一位中方与会者认为，停火、谈判的进程能否开启，主要取决于乌克兰、美国和北约的想法。如果美国和北约不再支持乌克兰，则乌方在战场上难以为继。如果美欧持续支持乌克兰，那么乌方可以支撑一场长久战争。也有外方与会者认为，即使失去美国支援，乌克兰也会继续战斗。他对相持局面的前景预测是：国际维和部队建立非军事区，俄罗斯控制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乌克兰由西方提供安全保障并加入欧盟。

另一位中方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已经达到了其终极目标的底线，可以接受停战，战略的主动权在西方。无论是俄罗斯官方还是俄罗斯学者都有清晰表态，俄罗斯不能接受失败。俄罗斯拥有核武器，因此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绝对不会爆发核战争。俄乌冲突已经与俄罗斯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俄罗斯不会把占领的四个州归还乌克兰，否则就意味着战略上的完全溃败。俄罗斯要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而西方不能接受，所以战争将会持续下去。

与会者进一步探讨了俄乌冲突引发核升级的前景。有外方与会者指出，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打击对象将是北约而非乌克兰；除此之外，俄方升级冲突的手段还有太空战、网络战。有中方专家认为，从美方的表现来看，美国和北约不会把俄罗斯逼到动用核武器的地步。

关于欧亚地区的特征及“一带一路”倡议，一位中方与会者分析道，欧亚地区一体化和分离的趋势并存；基于现实动机单方面对地区历史进行解释时常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外部力量介入欧亚地区事务并与地区内部力量互动。以上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地区形势格外复杂。中国最希望看到欧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和有效治理，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之义。

三、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有外方与会者对朝鲜半岛局势表示关切。朝鲜与俄罗斯近期达成的协议对朝鲜半岛和平以及国际体系安全构成了挑战。关于中日韩合作，近期中日韩三边关系出现了有益进展，中韩高层接触频繁。三国应借势在公共外交方面做出努力，提升三国公众对彼此的好感，建立互信，深化三边合作机制。关于美日韩合作，韩国加强三方合作意在应对朝鲜的核威胁，韩国需要有自己的核能力并寻求更强的核保护伞。同时，韩国只会与日本合作，而不会与之结盟。

有中方与会者分析了中国对东亚安全局势的担忧。第一，美日韩三国的行为正在持续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第二，日本和韩国等亚太国家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和美国越来越接近。第三，美国多边联盟发展趋势不断加强，日韩在军事方面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组织靠近。第四，国家安全逐渐成为日韩等美国盟友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主要矛头明显针对中国。经济层面的相互抵制也会增加外交关系中的不信

任，使外交对话更加困难。

有外方与会者强调了东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东盟对任何地区都不构成安全威胁，在经济上与中美都有密切联系，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中立，因而经常成为对立双方举行会谈的场所。然而，近年来东盟很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调和作用，主要由于以下四点：第一，中国和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尚未达成妥善的解决方案。双方都需要做出让步，但由于实力相差悬殊，东盟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更大让步。第二，美国希望将东南亚纳入“印太”战略，而东南亚国家对“印太”战略有自己的解读。第三，东盟和中国都希望印度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印度无法加入。第四，一些在东亚地区无端制造紧张局势的行为（如佩洛西访台）对东盟安全局势产生了负面影响。

东盟在国际事务中可以起到弥合裂缝的作用。东盟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机制，以增强该机制的包容性和中立性，并彰显东盟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同时，金砖国家未来将成为防止全球公共产品安全化的重要机制。

有中方与会者认为，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决定性因素。第一，亚洲国家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选边站”的压力大幅增加，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第二，亚洲曾经的经济利益优先的目标已经让位给了大国竞争，经济领域安全化趋势明显。第三，亚太国家对安全环境的评估更为负面，导致过去十年亚太地区军费增长迅速。第四，各国在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更加困难。朝鲜核问题有“印巴化”的趋势，很难实现无核化目标。第五，南太平洋岛国最近卷入了中美竞争。

对此，中方与会者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尽快稳定中美关系，让双方与地区国家知晓中美关系的前景、竞争边界和合作范围，以增加确定性和稳定性。第二，中美两国都需要支持地区国家独立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第三，需建立对话渠道和危机管控机制，以防止东北亚热点问题走向失控。第四，中美需要合作管控台湾问题的相关风险。

在讨论环节，有外方与会者建议，由于俄罗斯正深陷俄乌冲突，中、美、韩、朝应当率先重启四方会谈。关于“印太”与“亚太”的提法，部分与会者认为，美方“印太”的提法意在把中国排除在外；而多数外方与会者则认为，“印太”仅代表印度的加入，以实现亚太地区的均势。

四、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在一位外方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第一，由于实力欠缺，发展中国家总是既需要考虑自身的硬实力，也需要依靠国际秩序。第二，发展中国家难以适应世界秩序与地区安全局势的迅速变化。第三，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着贫困、债务、出口、能源与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多重危机。第四，俄乌战争引发的粮食危机和新冠疫情导致的通货膨胀促使发展中国家关注自身的经济韧性。因此，在全球秩序混乱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奉行多元化政策才能应对未知的风险和挑战。

两位中方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主要经济体采取安全化的经济政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逆全球化挑战更加严峻，但越南和印度等部分发展中国家从逆全球化中获益。第二，发达国家将比无法实现经济数字化的发展中国家更快地积累财富，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将愈发扩大。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经济带来的损失大于收益。第三，中美竞争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采取政治中立立场的空间越来越小，但它们也可以恢复不结盟的传统战略，同时从两个竞争对手那里获益。第四，国际组织的失效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获得的帮助越来越少。在现有的多边经济机构中，发展中国家将处于边缘化或结构性的不利地位。第五，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所产生的附带伤害将主要殃及发展中国家。第六，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多的国内治理挑战。

另有中方学者指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中国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重视发展中国家之间团结合作的必要性。中美可以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双方合作的“试验场”。

在讨论环节，多数中外与会者认为应当谨慎使用“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媒体使用这个词汇时往往带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可能无法覆盖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容易忽视各国的差异和需求。此外，能否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仍存在较大分歧。中方学者表示，由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同关切，中国更愿意成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而外方学者大多认为，不应再把中国描述为发展中国家，未来中国更可能加入全球北方的行列。

五、如何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

有外方与会者指出,“世界秩序”包括功能性秩序、区域性安全秩序及全球性安全秩序,后者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实力分配带来的秩序以及国家行为规范。当前,无论是功能性秩序、区域性安全秩序,还是全球性安全秩序,都面临严峻挑战。对此,应当重视联合国宪章的规范性作用,采用合作而非斗争的国际实力观,鼓励专业性的国际“二轨”合作。

有中方与会者提出,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等众多新概念,应当致力于进一步向世界解释清楚这些概念。中国与世界各国都需要自我提升,中美不应夸大双方全球秩序观的差异。

另有外方与会者表示,当前世界秩序的基本概念是均势,大国对这种秩序最为不适,“共同毁灭原则”影响的弱化使大国间产生了摩擦。其他国家也认为世界处于混乱状态,尤其是在政府层面,原则、规则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这说明战后建立的秩序已不能反映现实。我们需逐渐接受新的基础性概念,即“利益均衡”(balance of interest)。他建议继续推进联合国改革,如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认识到无法永享绝对权力,其行动将会更具战略性。还有外方与会者指出,应重塑外交模式,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战术性而非战略性的多边临时联合体为中心,实现战略型外交向问题导向型外交的转变。

有中方与会者指出,衰落的霸权国对国际规范最具修正主义倾向,而国际规范确实在发生负面变化。

另有外方与会者提出,当前我们正在走向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并存的多极世界。曾被视为公共空间和公共产品的国际机制被武器化、政治化。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由美国管理、联合多极世界中所有方面的“元体系”(metasystem)。若美国不为多极世界创立这样一个“元体系”,世界将经历长期的混乱甚至战争,而美国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其国内政治。

一位中方与会者表示,我们当前面临三重困境。其一,联合国各成员国对通用规范框架的不同解读阻碍了框架的有效实施,重建遵守框架的共识是各成员国的重要任务,大国应成为这方面的表率。其二,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存在模式竞争,我们很可能被困于“联盟式”或“社团式”规则制定中——国家集团在一系列功能领域中推广自己的规则与制度,

且只向接受规则的国家开放，形成安全、经济领域的集团，从而对供应链稳定的前景造成重大破坏。其三是过度安全化。对此，学者及领导人组成的智识团体应进一步研讨，形成对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以及国家利益的替代性或补充性共识。

另一位中方与会者指出，现代外交的三个本质特点正在日益被抛弃：一是基本信任，现在这种信任在大国之间难以达成；二是创造性，当下留给外交发挥创造性的余地越来越小；三是强调妥协，现代外交赋予了妥协很高的价值，但现在人们更多的是反对妥协。

六、讨论与总结

一位中方与会者对大国外交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大国应尊重中小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方案、全球倡议之外，还应思考弱小国家的忧虑所在。第二，形成对自身外交的反思纠错机制是大国的重要责任。第三，大国外交需要多样性、地方性和“软实力”，应建立更多多样化的社会参与机制和外交通道。

与会者还对近期突然恶化的加沙局势进行了讨论。有外方意见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外交，要有第三方积极发挥作用，首先把握好交换人质诉求与停火诉求之间的平衡，进而在强有力的国际支持下提出解决巴以问题的一系列完整的法律提案，以全面解决冲突。本届以色列政府上任以来一直忽视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长期性解决。我们须坚定重申巴以两国和平共存观念，但问题在于如何动员各国共同努力，这一点上中美可以合作。

最后，中外与会者表示，“北阁对话”为与会者坦诚、自由交换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以及学术思考提供了舞台，从而增进了各方对国际形势的理解，这样的机会十分宝贵，应该将这样的交流平台保持下去。

编辑：崔志楠 审核：于铁军
网址：www.iiss.pku.edu.cn
邮件地址：i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北阁
电话：+86-10-62756376

邮编：100871
传真：+86-10-62753063